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十二】

椰风蕉雨话侨情

海南归侨口述录

主编○林明江
副主编○林晓东

中国是一个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生计、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史出版社

椰风蕉雨话侨情

——海南归侨口述录

主 编 林明江

副主编 林晓东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椰风蕉雨话侨情：海南归侨口述录/林明江，林晓东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1

ISBN 978 - 7 - 5034 - 2264 - 5

I. 椰… II. ①林…②林… III. 华侨一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IV. K828.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297 号

责任编辑：韩军 胡修雷

封面设计：宋晓亮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装：北京凯通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0024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开

印 张：12.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中国是一个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生计、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侨华人关心着祖（籍）国的强盛与进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展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华侨华人团结互助、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有利于了解他们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就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为祖（籍）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史；而且更有利于我国总结开展侨务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了解华侨华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为党和国家制定侨务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提供参考和借鉴，更有针对性地为华侨华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以推进侨务工作的向前发展。

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就国外而言，华侨华人问题作为一个与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相关的移民问题，

于20世纪初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和相互的联系，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而成为热点研究的问题。就国内而言，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发展、繁荣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体现了四个特点：一是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年轻一代专家学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崭露头角，为研究带来兴旺的景象；二是新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协作更加密切；三是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文章和著作数量繁多，研究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四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注重现实侨情的研究，而且广泛涉及到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人口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研究的趋势。

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在历任学会领导和历届侨联负责同志、侨界前辈、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下，学会的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进展，不仅发挥了全国性侨史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协调的龙头作用，而且推进了地方历史学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资料收集、研究编撰、著书立说等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较好地发挥了侨史研究“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21世纪以来，随着华侨华人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华侨华人的研究。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旨在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供展示研究成果的阵地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采访老归侨，整理、出版老归侨口述历史是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于2004年开展的一项重要规划，这项规划得到了中国侨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已相继在山西、天津、广西、海南、广东和福建进行了采访活动。《椰风蕉雨话侨情——海南归侨口述录》是继《回首依旧赤子情》、《风雨人生报国》和《蹈海赴国丹心志》之后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开展的老归侨口述历史活动的又一新成果。该书依据口述录音资料整理而成，它记录了41名老归侨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们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归侨。几十年来，这些老归侨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心血、智慧和力量。他们奋斗在各行各业，其中既有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也有默默耕耘的寻常百姓；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全国劳模和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中有的是历经磨练的革命者，有的是经济界的精英，有的是专业领域的开拓者……他们的人生历程各不相同，但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为了真实地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将本书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十二》出版。

在此，我衷心希望：《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的问世，有利于将华侨华人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2008年8月

目 录

序	/ 1
在“抗义”与中侨委生活的回忆	陈 军 / 1
百舸争流勇为先	陈受炼 / 11
甘当中越友好的桥梁	邓文端 / 17
立志为侨了此生	杜澄波 / 29
卅一载苦心育桃李 十二年精心做侨务	冯清明 / 40
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里	冯万本 / 46
我一生中的“六个一”	冯玉成 / 66
继承先辈遗志 实现人生理想	冯子平 / 82
永远的丰碑——怀念我的父亲符克	符曼芳 / 96
我与兴隆华侨农场的不解之缘	何如伟 / 112
乐为家乡育英才	黄 松 / 124
回忆我的父亲雷贤钟	雷德万 / 134
风风雨雨无怨悔	李清泉 / 143

我在儋县侨联工作的点滴回忆	梁勋华 / 151
我的一生还很顺利	林 勇 / 156
平平淡淡也是真	刘道利 / 164
“河婆新厦，侨乡府第”	刘少明 / 171
冲破封建大家庭的藩篱	倪曼云 / 180
一个放牛娃的成长道路	潘奇思 / 192
华侨农场的普通建设者	潘钦荣 / 198
坎坷人生路	施继伯 / 204
美丽的海南是我的根	唐冠雄 / 210
种得金薯济世人	王家经 / 221
难忘的革命岁月	王 伍 / 228
爱国爱乡心不变	王 湛 / 234
关心着祖国统一大业的南侨机工	吴惠民 / 243
《全民报》上写春秋	吴坤佳 / 248
艰难人生总信真	谢式伟 / 257
不当亡国奴：一位南侨机工的经历	谢章农 / 261
热心为侨服务的“哥泽”	邢福泽 / 268
在平凡中坚持	严崇喜 / 277
平生未曾轻言悔	杨光凌 / 284
回祖国吃番薯也甘愿	杨庆荃 / 291
无怨无悔跟党走	云昌深 / 297
丈夫生乱世 不用叹非时	云 凰 / 306
舞起绚丽多姿的人生	云 平 / 317
心中永远不忘加影母校	云心影 / 327
感谢党对我的培育之恩	赵世发 / 337

因越南归侨身份而获得的工作经历	钟业椿 / 348
“没有不好的老百姓,只有工作不到位的干部!”	周松 / 358
回忆我的父亲周铮	周玉云 / 367
附 录	
他曾为毛主席修理汽车	卓兰花 / 379
他曾为毛主席开过八年车	卓兰花 王仪 / 383
后 记	/ 388

在“抗义”与中侨委生活的回忆

陈军

被采访者简介：

陈军，男，泰国归侨，1925年12月出生于海南海口市，1937年到泰国曼谷。抗战爆发后参加“泰国抗日义勇队”，从事革命工作。1953年10月回国。1954年5月分



陈军近照

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1969年到1972年，在中侨委“五七干校”任第二连二班班长。1972年底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市石景山区革委会任办事处党支部副书记，1979年4月调回侨政司，负责落实政策和安置归侨等工作。1981年底被任命为副处长，1983年12月离休，现居住在海口市。

采访时间：2007年6月15日

采访地点：被采访者住所

采访者：程希 吴甫 胡修雷 乔印伟

整理者：乔印伟

一

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之一是我参加革命活动，参加“泰国抗日义勇队”，以及后来入党参加革命工作，前后共 10 年时间（1944 年 5 月到 1953 年 10 月）。

我是 1925 年出生的，1937 年出国。那个时候，家里流行霍乱传染病，我哥哥在泰国开冷饮店，我跟同村的水客一起，到了泰国。我在哥哥的店里做小工，卖咖啡、冷饮，洗杯、洗碗等，帮助他做生意。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登陆占领泰国，泰共组织领导人民进行反抗，1942 年组织“抗日义勇队”。1944 年初，我参加了“泰国抗日义勇队”（简称为“抗义”），“抗义”是 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当时人很少，1944 年时大力发展。我是 1944 年三四月份正式参加“抗义”的。当时泰共准备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我们是作为后备队准备战斗的。“抗义”的成员是工人和店员，设中队和小队。我在小队，成立时是林勇同志任小队长，大概是 1944 年秋天，他离开后我接任队长，全队 10 个人，住宿不在一起，有部分集中住在宿舍，也有几人分散住。

我投身到革命活动，有个发展过程，也有一些思想基础，这就是我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影响到我的思想发展，向往光明，追求进步，要做一个有为的革命青年。我在家乡只读了四年小学，后来辍学去泰国，那时 13 岁，到泰国后也不再有机会念书。但我喜欢看报，自学书本，又很关心抗日战争的发展，经常查看地图，看日寇占领我国的土地到什么地方了。在这几年中（1938—1944 年），我先后阅读了不少的进步书籍，书有的是我哥哥买的，有的是友人介绍或借给我的。

主要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访问记》、《朱德访问记》等一些有关共产党领导革命和“苏区”生活的书籍，还有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年少漂泊者》、《八月的乡村》以及巴金的《灭亡》、《新生》等一些进步小说。其中斯诺和邹韬奋的书对我影响最大，《萍踪寄语》是邹韬奋到欧洲和苏联考察后写的，书里特别写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的一些情况，使我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产生了敬仰崇拜，对苏区当时人们的生活学习非常羡慕，对苏联的社会产生憧憬，希望有一天也能和他们一样地工作、生活。参加“抗义”以前，我还从友人处借阅了地下抗日的报纸《真话报》（泰共机关报），我还参加了“曼谷铁器工人互助社”，在该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学习班，参加锄奸活动，警告那些为日本生产军火的奸商。这时候，思想上慢慢产生一些变化，自己的思想认识与觉悟提高了。由于在店中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一时也不能离开，限制了行动自由，像关在鸟笼里的鸟一样。我觉得仍留在哥哥店中，已不能适应当时活动的要求了，特别是在参加“抗义”后，有时白天和晚上要开会，很不方便。于是慢慢产生离开哥哥店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我决定离开店，到“抗义”的宿舍住。这一行动对我以后投入到革命活动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是促使我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的关键一步。

我在“抗义”前后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抗义”的生活不像国内的游击队专门和日本鬼子战斗。筹建与训练是重点，主要内容一个是学习，一个是行军训练，学习枪法。我们白天要到工厂做工，晚上或礼拜天才能够活动。活动包括政治学习和行军训练。政治学习，由指导员讲指示或者当时的形势。还有加强组织纪律性方面的问题，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还传达学习“项英路线”的内容。为什么要学习呢？意思是说对敌人任何

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当时项英主要是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影响，没有正确地放手发动群众跟国民党进行斗争。它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中央的一些指示没有贯彻到底，后来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惨案。组织行军训练和学习枪法方面，枪法学习不多，总共两三次。记得有一次行军训练（长途），早上6点钟起来，从驮叻蒲到北榄口，前后约有10个小时，在到北榄口后休息吃午饭即折返住地，累得有些工友第二天都上不了班。因为平时没有走这么多的路，突然搞行军训练，确实是个考验。

我到“抗义”，开始没有工作，只靠吃救济饭过日子，后来先后到日本的酿酒厂和造船厂工作，我们当时到这些厂工作，有两个目的：一是生活；二是团结教育工人宣传抗日，在工作中磨洋工，破坏其生产。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抗义”宣布解散，队员都回到原来的单位去。“抗义”没有和日寇军队发生过战斗，与日寇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不同，这些地方它是经过战斗强行占领的。因为日寇是和平登陆占领泰国，泰国政府又与日寇结成同盟国，它既不抵抗日军的占领，还限制和镇压人民的抗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的抗日斗争发展较慢，在“抗义”即将开始行动时，日本宣布投降，所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斗（泰国南部的“抗义”袭击过日军）。

在“抗义”中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一是生活上吃苦耐劳，二是组织纪律性加强，三是为以后进一步参加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二

“抗义”结束后，我到了铁器工厂互助会，组织上分配我教工人文化课。虽然我上学时间不长，那时候工人没怎么读书，我又学习过“国语拼音符号”，普通话可以讲一些，还可以教他们，就教他们普通话，过去叫国语。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在1945年十二月份结束，因为我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1946年1月我就参加了党，那时候叫泰共。发展我入党的原因有：一是我没有离开组织。日本投降后有些人走了，认为任务完成了，就离开了组织；我一直没有离开，而且分配我工作我一直做。二是一直参加各种活动。当时国民党在那里搞分裂中泰人民的活动，我们称他们为汉奸，进行反对，组织了一次反奸游行活动，我参加纠察队，保护队伍。这是1945年11月或者12月的事。还有1946年初的和平联欢大会，原打算庆祝抗战胜利，泰国政府没有批准，组织工作推迟到1946年。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纠察工作。三是日本投降后，华侨中的爱国活动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客观上需要的干部多，当时党组织也是大发展时期。

我一参加党组织，即被派到刚成立的“茶店工人互助社”帮助工作，我不是互助社的主要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纪念章（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二〇〇六年转发）

责人，但实际上是要起到核心作用。从 1946 年初到 1947 年底，我的工作是日常联系、联络感情之类的。1948 年初，党调我担任五联支部（洋务工人、洗衣工人、面包工人、旅店工人和茶店工人等五个支部联合）书记。原来的书记调走了，形势不太好，支部活动不多，没有大活动。到 1948 年 6 月 15 日，这是个关键的日子，泰国发生军人政变，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政变是由銮披汶发动的。本来他与日本合作，应当作为战犯给予审判，但盟军没有重视，他被放掉了。他这个人比较反共反华，他发动政变后，实行反动的反共政策，我们的一切活动转入地下，华侨爱国运动进入了低潮时期。6·15 事变总共逮捕了 40 多名工会、学校和报馆的领导，后来这些人以莫须有的名义被驱逐出境。1948 年下半年，我就调到曼谷市委，先后任宣传部干事、主任、青妇工作部主任等，差不多到 1952 年。这个时期活动较少，学习也不太多，主要是办干部训练班，利用纪念日进行思想教育等。后来大概是 1953 年初，我被调任“新民区委”书记。当时为了开展广泛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工作，把一些在原群众团体中不太暴露的干部、积极分子重新组织起来在街道中开展工作。为适应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成立“华侨爱国会”，这些干部、积极分子，均成为会员，以爱国会的名义在群众中活动。“新民区委”是“爱国会”的领导，我当时就是负责这个工作。由于我们的干部、积极分子多是些店员、工人，开展活动有一些困难，工作成效较慢。后来慢慢地停止了活动，时间是在 1953 年底。

这一段经历，是我人生历程的重大转折期，是从追求进步、向往社会主义与仰慕共产党等，到实际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党组织，是促使我终生走在革命大道的决定因素。后来我回国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那时打下的思想基础。

三

我是1953年10月回国的。在国内工作，从1954年到1983年底，整整三十年。最值得回顾的时期是1954年到1959年。这段时间里，我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国外的群众、地下工作者转变为公开的政府机关干部。环境与工作性质都起了变化，这是从不适应、不熟悉到逐步适应、逐步熟悉的过程。我在工作学习中，使自己逐步有了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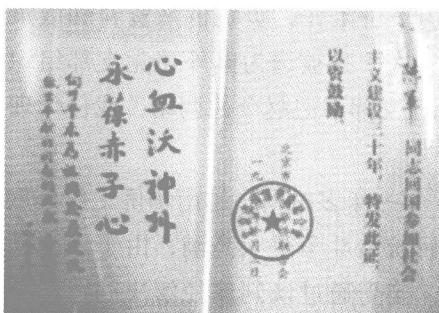
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最好的时期。政治形势好，人民团结安定，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高涨。我于1953年10月从泰国回国，在广州学习了半年，主要是整党学习。1954年4月调到北京，5月就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工作，那时候叫“中侨委”。1954年到1958年底，我在国外司越菲科工作。这个机构名称后来多次更改，国外侨务政策，越南、菲律宾和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华侨工作，都归这里管。我本来是泰国回来的，因为越南华侨工作方面没有人，就分配我做越南的华侨工作，负责侨情资料和政策研究，生活比较平静。1956年底，我被选为国外司党支部组织干事；1957年7—8月起，原任支部书记赵今德调动，我任代理支部书记，约至1958年底。

在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一年多时间，越南华侨工作是重点。1954年，越南的反法殖民统治斗争进入高潮，由于法国已难于继续维持对越南的统治，接受通过谈判途径解决问题，结果召开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这期间，越南发动了奠边府战役，消灭了法国上万人，法国撤军，最后谈判确定把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越共占领北方，保大占领南方。美帝随即插手：劫持

大批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工商界人士到南方，包括华侨也是如此，华侨中反应很大。此时，越南华侨工作突出起来，外交部要侨委草拟一个声明，对美帝劫持华侨表示抗议。国外司领导叫我起草。我当时按指示写了草稿，完成了任务。

当时越菲科科长黄振勋等两三人被派到了越南使馆，科中只我一个人（另一位是管菲律宾工作的），一面做一面熟悉工作。这时的工作非常繁忙，与大使馆来往电文频繁，重要的大事由司领导直接处理，其他全部由我负责起草初稿。这时期最重要的事有：越南华侨工作由谁领导？越南华侨国籍问题，到底是保留中国国籍还是慢慢地转变为越南国籍？社团里面的报馆、学校，这些干部应享有怎么样的待遇？学校交给越南领导还是我们领导？如何处理？后来决定华侨工作交由越方领导；在华侨的社团、报馆学校中工作的华侨，应享有同越南干部同等待遇；国籍问题，现在不要提了，越南把华侨视同越南人民一样对待，经过长期工作，潜移默化，使华侨逐步自然地转化为越南人，这样有利于两党、两国的工作和社会主义事业。

这些比较大的问题我们也是参加处理的。为什么提出这些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30 周年纪念证书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发）

问题呢？因为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关系最好，“同志加兄弟”，胡志明同志讲过这个话。华侨在那里，是让我们领导还是越南来领导？这个过程中大部分都是领导决定，我们帮助收集资料。这些大的问题要报到上层领导，除了我们外，还要报